

情緒政治與 2016 年總統選舉*

陳陸輝**

《本文摘要》

本研究分析情緒如何影響選民的投票選擇，我們運用 2016 年總統選舉後執行的「臺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Taiwan's Election and Democratization Study, TEDS) 資料，檢視民眾對於三位主要候選人的政治情緒，對於他們投票行為的影響。過去的研究指出，一些像是希望或驕傲的正面情緒，以及諸如憂慮或恐懼的負面情緒，對民眾意見或態度的形成具有重要影響。在 2016 年的總統選舉中，並無現任總統參選的情況下，民眾在展望未來、回推當下之後，定將仔細思索應該如何選擇他們未來的總統。從 21 世紀開始，有關情緒政治的相關研究愈來愈多，本研究從臺灣民眾對於 2016 年選舉中三位主要政黨候選人的政治情緒出發，說明因為對於民進黨提名人蔡英文女士的正面情緒多而負面情緒少，是她得以贏得大選的重要因素。而民眾對國民黨提名人朱立倫先生則是在三位候選人中具有最多負面情緒者，也因此讓他不受民眾青睞。本研究指出，未來在考慮解釋臺灣民眾在總統選舉的投票傾向時，也應該將政治情緒的角度納入。

關鍵詞：情緒、總統選舉、臺灣

* 本文初稿曾在 2016 年政治大學政治學系「政治學工作坊」發表，感謝主持人蘇彥斌教授的邀請，評論人蔡中民教授、郭承天教授與蔡宗漢教授提供的寶貴建議。也感謝本刊三位審查人提供非常具體而深入的修改意見，大幅提昇本文水準。此外，也感謝牛銘實教授在政治情緒研究的啓發，以及科技部計畫（計畫編號：MOST 104-2410-H-004-094-MY4）提供的經費。

** 國立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員、政治學系合聘教授暨台灣政經傳播研究中心。E-mail: chenluhu@nccu.edu.tw。

壹、前言

在西方的研究傳統中，情緒 (emotions) 往往被視為「不理性的」(irrational) 而少受重視。不過，自從 1980 年代以來，相當多的研究指出：情緒或是好惡的情感可以視為選民降低資訊處理成本的重要啟發式的線索 (heuristic cues)，並可用以協助選民面對複雜的政治世界。事實上，情緒可以幫助我們面對並處理潛在的威脅且在政治現實中做出適當的決策。

在臺灣的選舉研究中，民衆對於候選人的評價、政黨認同、議題偏好以及統獨立場，一直是左右他們投票抉擇的重要因素。不過，近年來對於政黨對立的極化政治現象也引起學者的關注。特別是在選戰過後，勝選政黨的治理往往引來在野黨的嚴密審視與不斷抨擊，長此以往，選民對於政黨或是重要政治人物，是否具有更多的情緒反應？而此情緒反應，會不會進一步影響其投票行為？此一現象，對於國家的治理又產生何種影響？頗值得關注。因此，本研究將利用選民對 2016 年三位總統候選人的情緒反應，運用國內外既有的研究成果，來檢視情緒對於選民投票行為的影響。

貳、情緒與政治判斷

本研究關注的是民衆對總統候選人的情緒。對於情緒的定義，Fiske 與 Taylor(1991) 指出：情緒是遠比好惡感受更複雜的情感混合。情緒包括了欣喜、平靜、生氣、悲傷、恐懼……等各種不同的狀態。Houghton(2009) 認為：情緒基本上是「目標導向」的 (object-specific)，是因為特定的人或事所引起的好惡反應。至於心情 (mood) 則與特定的人或事無關。所以一個人也許對於川普總統或是蔡英文總統的行為舉止或是施政表現而有不同的情緒，但是可能只是因為「春和景明」，而有好的心情。不過，他也認為，情緒雖是目標導向的，但其持續性未必較心情來得短，像是民衆對於政黨或是政治人物的情緒，即可能相當持久。因為情緒往往是多樣的，所以 Lazarus(1991, 11) 談到情緒時，特別用複數 (emotions)。他認為情緒是我們面對外在環境時，所引起的各種反應。當面出現有所阻撓的外在環境，人們出現的情緒反應，會跟環境是否出現對自己有利的情況有所不同。而 Marcus、Neuman 與 MacKuen(2000) 整理政治學過去對情緒的相關研究，他們發現：政治學者將情緒視為是個人對於政治對象認知處理的最後階段，是影響民衆運用即時資訊做成政治判斷的關鍵要素 (Lodge, McGraw, and Stroh 1989)。以 Fiorina(1981) 的觀點為例，他就認為民衆的政黨認同並不是長期穩定的，而是一個因為政府表現好壞，而不斷即時更新的結果 (running tally)。而 Fiske 與 Pavelchak(1985) 則將情緒視為個人儲存對政治人或事評

估結果的情感好惡的標籤 (affective tag)。例如，我們在蒐集了對於川普總統各種行為或是政策之後，會給予他一個或是多個情緒的標籤。也許覺得充滿活力，也許擔憂，也可能好壞兼備。至於 Rahn 等 (1990) 則將情緒視為一個人對政治人或事的總結評估。Marcus、Neuman 與 MacKuen (2000) 從兩個功能來討論情緒，他們將其可以區分為兩個面向，一個是將情緒視為個人既有的性格 (disposition)，另一個則檢視情緒對外在環境變化的監看 (surveillance)。當外在環境如常時，我們會以既有的性格，繼續執行原先既有的工作。如 Lazarus (1991, 11) 所說，我們會有開心、驕傲、輕鬆……等的情緒，繼續完成手上的工作。例如我們進辦公室時，一切如常，我們會繼續完成手邊的工作。不過，當外在環境有異甚至出現威脅時，我們會因為環境給的刺激不同，而開始監看所在環境的變化，並有生氣、憂慮、恐懼……等不同情緒。例如，當我們進到辦公室發現科技部的研究計畫沒有通過時，就會因為下年度的研究計畫無法執行，以及自己的助理沒有研究經費可以支持，而感到憂心忡忡，並改變原有向科技部申請經費的作法，轉向其他單位求援。

因此，民衆對於政治人物的情緒反應可能是相對多元而複雜的，這些或許是熱情洋溢或者是憂心忡忡的情緒，會不會影響到他們的投票抉擇？相當值得關注。本研究將以民衆對於候選人的政治情緒，來解析其對選民投票抉擇可能具有的關聯性。

在過去的選舉研究中，以經典的《美國選民》(*The American Voter*) 為例，作者 Campbell 等 (1960) 在他們的漏斗因果模型 (funnel of causality) 中，以選民長期而穩定的政黨認同為主軸，而將選民對於議題的立場以及對候選人評價視為短期的因素。儘管他們認為候選人評價相當重要，但是，在漏斗因果模型中，政黨認同才是主導選民投票行為，甚至影響選民對候選人評價以及議題立場的關鍵因素。也因為如此，後續有相當多學者批評他們，而認為候選人評價這個因素應該更受到重視 (Miller and Shanks 1996; Niemi and Weisberg 2001; Wattenberg 1991)。

Abelson 等 (1982) 在密西根大學政治研究中心 (Center for Political Studies, CPS) 的邀請下，設計了一組題目來瞭解民衆對於總統候選人的情感以及對他們人格特質的評價。這些題目除了對於候選人特質 (candidates' traits) 的測量外，他們也提供了一些民衆對總統候選人的情緒上反應之測量。在民衆對總統候選人情緒的反應上，Abelson 等 (1982) 提供了兩個面向，即正面的情緒以及負面的情緒的測量。其中，在正面的情緒上，包括了快樂的 (happy)、希望的 (hopeful)、喜歡的 (liking)、驕傲的 (proud) 以及有同理心的 (sympathetic) 等情緒。至於負面情緒則包括害怕的 (afraid)、憤怒的 (angry)、噁心的 (disgusted)、不喜歡的 (dislike)、沮喪的 (frustrated)、悲傷的 (sad) 以及不舒服的 (uneasy) 感受。Abelson 等 (1982) 的開創性設計，是政治情緒對選民投票抉擇研究的重要里程碑。

儘管上述的測量是針對民衆對於總統候選人的情緒感受，不過，傳統西方的觀點，常

常將理性思維 (reason) 視為情緒反應 (emotion) 的對立面，也因此，情緒常不被視為理性的，使得情緒因素在強調公民要理性判斷的投票研究傳統中，未受到應有的重視。不過，隨著認知心理學的快速發展，以及國內外政治局勢的快速變化，Brader 與 Marcus(2013) 即指出，從 1990 年以來，對於情緒研究的出版正大量地增加。正如 Marcus、Neuman 與 MacKuen(2000) 所指出的：民衆的情緒感受會塑造他們對政治的看法。在現實的政治生活中，情緒可以幫助民衆關注以及涉入政治相關事務與訊息，且透過情緒傳遞周遭環境的訊息，指引我們進一步搜索資訊。Brader(2014) 也認為，情緒可以當作我們觀察外在環境是否出現威脅警訊的重要動機驅力 (motivational impulses)，並協助我們採取因應行動。相對來說，當人們覺得所處的環境是安全且合乎期望時，人們會感到平靜，而依照「其既有習慣或是行為採取行動」(Brader and Marcus 2013, 178-179)。學者用對周遭環境的「評估」(appraisal) 這個名詞來表示我們「大腦對內在或是外在環境的評估總結。」(Brader and Marcus 2013, 172)。至於「評估」的面向，如我們前面文獻提及，Abelson 等 (1982) 提出選民對候選人情緒的正面或負面兩個面向。Roseman、Abelson 與 Ewing(1986) 則在其政治溝通的研究中提出了四個面向。Conover 與 Feldman(1986) 則在民衆對經濟情況的反應上，提出憂慮、生氣以及正面情緒等三個面向。Marcus、Neuman 與 MacKuen(2000) 則利用正面情緒 / 熱血的、負面情緒 / 焦慮的以及厭惡 (aversion) 等三個面向來討論民衆的政治推理 (political reasoning)。而 Brader 與 Marcus(2013, 169) 對於情緒也提出兩個面向，一個稱之為正面 (positive) 情緒，另一個稱之為負面 (negative) 情緒。由於國內對於候選人政治情緒的相關研究相對有限，因此，本研究也將延續此一分類，將先以正面與負面兩個面向下的各種情緒來捕捉民衆在 2016 年總統選舉中對於總統候選人的情緒反應，再依照國外學者的建議，將各種情緒簡化為正面情緒與負面情緒，看看其解釋效力是否有差異。

有關民衆情緒的不同面向，Lazarus(1991, 217-296) 以快樂 (happiness/joy)、驕傲 (pride)、喜愛 (love/affection) 以及鬆一口氣 (relief)……等作為正面情緒。至於負面情緒包括憤怒 (anger)、焦慮 (anxiety/fright)、罪惡感 (guilt/shame)、悲傷 (sadness)、嫉妒 (envy/jealousy) 以及噁心 (disgust)……等情緒。Brader(2014, 195) 則提出三個例子來說明三種情緒。首先，是熱血的 (enthusiasm)，當我們愈來愈接近我們目標時，我們會感到熱血的且持續進行我們在做的事情。第二種是恐懼 (fear)。它是當我們面對威脅情況時，我們會考慮改變我們例行的行為或是採取新的做法以避免危險或是不讓壞的情況產生。最後一個是憤怒 (anger)，當我們覺得別人要拿走我們想要的東西時，我們會感到憤怒，甚至會進而挑戰或懲罰那些阻止我們的人。

上述各種不同的情緒分類中，恐懼是受到學者關注最多的 (Brader and Marcus 2013, 177)。Brader 與 Marcus(2013, 178) 即指出，恐懼「是情緒的產物」(也就是行為抑制系

統，behavioral inhibition system) (Gray 1987)，會讓我們開始監視環境中潛在的威脅，並採取相對應的行為)。因此當我們面對不確定的威脅或是潛在的傷害時，恐懼的民衆會傾向蒐集更多資訊 (Marcus and MacKuen 1993)，且會表現得「在風險評估上更爲悲觀並（採取）規避風險的行動」(Lerner and Keltner 2001)。此外，政治學者對於焦慮以及憤怒的研究也不少。當選民對候選人感到焦慮時，會增加政治涉入以及蒐集有關候選人對特定政策立場的更多資訊 (Marcus, Neuman, and MacKuen 2000)。但是憤怒卻讓人對於風險採取較爲樂觀的評估，或採取較爲冒險的行為 (risk-seeking behavior)(Lerner and Keltner 2001)。

另一組情緒則常被稱之爲正面情緒，包括喜悅、快樂、熱血、希望與驕傲。學者認爲這些情緒是行為啓動系統 (behavioral approach system)(Gray 1987)，他們是「用以規範與採取追求回報的行為」(Brader and Marcus 2013, 175)。Marcus 與 MacKuen(1993) 引用熱血的來標誌這些情緒。經濟繁榮等正面資訊可以讓一個人感到熱血、民調中自己喜歡的政黨領先、或是聽到自己喜好的政策將執行的新聞報導 (Brader, Valentino, and Suhay 2008; Marcus, Neuman, and MacKuen 2000; Valentino, Gregorowicz, and Groenendyk 2009)。Marcus 與 MacKuen(1993) 的研究發現：民衆正面的情緒是讓他們進一步採取支持候選人行動的重要因素。不過，相對於負面的情緒，正面情緒的研究受到較少的關注。

在本研究中，我們將以民衆對 2016 年總統選舉中三位候選人的情緒反應，來檢視民衆的政治情緒如何影響他們的投票行為。特別是在控制一般選舉研究的重要變數之後，民衆的政治情緒對其投票行為是不是仍然具有影響力？這是本研究關注的焦點。

參、研究設計、變數測量與資料

本研究關注在民衆對於 2016 年三位總統候選人的情緒反應，我們採用 2016 年選後執行的「臺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Taiwan's Election and Democratization Study, TEDS) 的資料。¹ 本次調查爲 TEDS 研究團隊在 2016 年總統與立委選舉之後所進行的大規模面訪調查，抽樣方式係從臺灣地區 73 個區域立委選區中依照北北基宜、桃竹苗、中彰投、雲嘉南、高屏澎及花東離島等 6 個地理區分別隨機抽出代表該區人口比例的選區共計 37 個選區進行訪問，最後訪問成功的有效樣本數爲 1,690 位。

在選民對於總統候選人的情緒反應上，TEDS 團隊運用以下的方式進行測量。我們詢

¹ 本研究使用的資料爲「2012 年至 2016 年『選舉與民主化調查』四年期研究規劃 (4/4)：2016 年總統與立法委員選舉面訪案」(計畫編號：MOST 101-2420-H-004-034-MY4)。該多年期計畫主持人爲黃紀教授，更多相關資訊可以參考該資料庫的網頁：<http://www.tedsnet.org>。政治情緒題組的設計，是由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的徐火炎教授負責，作者感謝上述人員與資料庫的團隊成員提供本論文資料，不過，對於資料的分析與詮釋，概由作者負責。

問受訪者：「請問哪一位候選人的作風或作法最讓您生氣？」（會生氣），然後由受訪者在三位候選人，蔡英文、朱立倫或宋楚瑜之間挑選一人。同樣地，我們繼續詢問：「請問哪一位候選人的作風或作法最讓您最不放心？」（不放心）、「請問哪一位候選人最能讓您覺得台灣有希望」（有希望）、「請問哪一位候選人最讓您感覺到『身為台灣人的驕傲』」（感驕傲）？然後也分別請受訪者由三位候選人中挑選出一位候選人。我們在資料分析時先將每一個題目與其投票對象作初步的交叉分析，然後在統計模型中再以虛擬變數的處理方式，將每一個題目處理為對三位候選人的情緒反應。由於在四種情緒中，我們可以將「會生氣」或「不放心」歸類為負面情緒，而「有希望」以及「感驕傲」可以歸類為正面情緒。在統計模型中，我們可以將民衆對三位候選人的四種情緒納入分析，也可以將三位候選人的情緒，以因素分析的方法將各種情緒歸類為正面與負面兩類。第一種方法的好處在於我們可以檢視個別情緒的可能影響，不過，因為共納入 12 個解釋變數，在模型上較為繁瑣。因此，我們也利用因素分析的方式，將 12 個變數精簡為對三位候選人的正負面共計 6 個解釋變數。就模型建立或是理論解釋上，變數能夠予以縮減的精簡模型，若是具有相同的解釋力，當然較佳。此外，依照 Marcus 與 MacKuen(1993) 的研究，也是將情緒以因素分析萃取出正面或是負面兩類，以檢視不同類型的情緒對政治行為的影響，本研究成果也可以與其比較與對話。我們在以下的統計分析，也將檢視上述兩種不同情緒變數的資料處理方式在統計模型的表現，看看在解釋民衆政治情緒上，運用哪種分析模型較佳。除了上述變數之外，本研究也將民衆的性別、年齡、教育程度、省籍、政黨偏好、統獨立場、臺灣人認同等變數納入成為控制變數。在臺灣的選舉研究中，上述的變數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本研究依照過去的研究成果，納入作為控制變數，以分析在控制上述變數之後，民衆對候選人的政治情緒，是否仍然具有重要作用。² 由於「選賢與能」或是「選人不選黨」，是臺灣公民教育宣導的重要價值，這也凸顯了候選人本身的能力或是特質對選民投票抉擇的影響。在候選人的形象或能力評價部分，從過去的研究（例如黃秀端 1996；鄭夙芬、陳陸輝與劉嘉薇 2005）均認為，以對候選人的情感溫度計可以取代對候選人各項能力的評價，因此，本研究將納入情感溫度計的測量，並檢視控制住對候選人的情感溫度之後，選民對候選人的情緒是否仍然與其投票行為間具有顯著的關聯。

本研究延伸 Marcus 與 MacKuen(1993) 的研究成果，他們發現：以對候選人充滿希望 (hopeful)、驕傲的 (proud) 以及討人喜歡的 (sympathetic) 三個正面情緒所測量之選民的熱情 (enthusiasm)，對民衆的投票抉擇以及對選舉的關注，具有顯著的影響，而以對候選

² 相關的研究非常多，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參考黃紀、劉義周與陳陸輝（2013）所做的文獻整理。針對 2016 年總統選舉的專書也可以參考陳陸輝主編（2018）的中文專書。此外，彙集國內外學者而由 Achen 與 Wang 主編（2017）的英文專書，讀者也可以參考。

人害怕的 (afraid of)、厭惡的 (disgusted)、生氣的 (anger) 以及不安的 (uneasy) 四個負面情緒所測量之選民的憂慮 (anxiety) 情緒，則讓選民更積極蒐集對候選人相關的資訊，但對其投票抉擇並不具有影響。³ 他們的研究係使用在 1980 年與 1988 年兩個年度各執行的定群追蹤資料，因此，用以說明兩類情緒對選民在選舉資訊的蒐集以及競選過程關注之「變化」上，研究結果頗具啟發性。本文關注選民的投票抉擇，因此，依照 Marcus 與 MacKuen(1993) 的研究發現，我們認為：在選舉過程中，選民對候選人正面的政治情緒，會激起民衆的熱情進而支持特定候選人。至於負面的情緒，雖會引起民衆對候選人政治立場的關注，卻對投票的抉擇並無具體的影響。本研究假設，儘管負面情緒的研究相對受到重視，但是，要能夠激起選民的熱情，進而讓選民願意進投票所投下神聖的一票，是需要對於候選人有正面情緒的。因此，本研究假設民衆對於三位候選人正面的情緒，會影響選民的投票抉擇。至於民衆對於候選人負面的情緒，依照前述文獻的整理，雖然會啟動他們的行為抑制系統而開始蒐集對於候選人各項政治立場的相關資訊，不過，本研究預期在控制其他變數之後，其對選民的投票抉擇，並不具備顯著的影響。

肆、情緒與投票抉擇

在 2016 年的選舉當中，執政的國民黨歷經 2014 年「太陽花學運」的衝擊以及 2014 年底縣市長選舉的慘敗，形勢相對低靡。在國民黨總統提名的過程中，原本有楊志良與洪秀柱兩位辦理登記，不過，經過連署書的查核之後，只有洪秀柱通過門檻得以參加。洪秀柱且在 2015 年的 6 月 12 日到 13 日經過國民黨中央委託三家民調機構進行調查後，以平均 46.20% 的支持率通過 30% 門檻。並在該年 7 月 19 日經過國民黨召開的全國黨代表大會，通過提名她為國民黨總統參選人。不過，因為在洪秀柱被國民黨提名之後，國民黨的整體聲勢未見好轉，黨內希望更換洪秀柱的聲音不斷，也因此，在該年的 10 月 17 日國民黨又召開臨時全國代表大會，通過「廢止」提名洪秀柱為總統參選人，改徵召時任新北市長的黨主席朱立倫參選。此一「換柱風波」，引起諸多爭議，也讓民衆對國民黨提名的參選人朱立倫有不同的情緒反應。以下我們先從簡單的交叉分析，看政治情緒與選民投票傾向的關聯，接著以模型檢視，在控制其他重要變數之後，政治情緒與民衆投票傾向之關聯性。

³ 他們在 1988 年的研究則使用對總統候選人是否感到熱情 (enthusiastic)、感興趣 (interest)；心煩意亂 (upset)、憂慮 (anxious) 等測量，以受訪者 0-100 分表示其具有上述情緒的程度。後續的處理他們同樣將其建構為熱情的與憂慮的兩個指標，進行分析。

一、民眾在 2016 年對三位總統候選人的政治情緒

在 2016 年的總統選舉，民進黨提名人蔡英文最終以 56.12% 的得票率，贏得總統大選，民進黨且一舉獲得國會超過半數的席次，讓該黨首次同時掌握行政權與立法權。至於國民黨參選人朱立倫，僅獲得 31.04% 的得票率，而親民黨的總統參選人宋楚瑜則獲得了 12.84% 的選票。如上所述，我們可以想見，時為國民黨主席的朱立倫，當因「換柱」風波而在競選期間造成諸多爭議。我們從表 1 中，民眾對於三位總統參選人的情緒分布可以略知一二。在表 1 中，我們詢問民眾對三位總統候選人中哪一位最讓民眾感受到特定情緒，當受訪者指出特定候選人時，我們將他歸類為對該候選人具有「特定」的情緒，將「都是」或「都沒有」放入「其他」類別，而將「拒答」、「無意見」和「不知道」等答案歸類為「無反應」，並在後續的分析中（如表 2）排除「無反應」的類別，讓資料分析更加適宜。從表 1 中我們發現，當詢問受訪者哪位總統候選人最讓他感到生氣，有高達四成二的民眾對於朱立倫感到生氣，對蔡英文或是宋楚瑜都在一成以下，此外，約有兩成八的民眾表示「都是」或是「都沒有」是歸類為「其他」類別，至於沒有表示具體情緒的「無反應」類別上則有一成一。而哪一位候選人讓民眾覺得不放心？我們發現朱立倫有大約三成七的比例，至於蔡英文或是宋楚瑜大約都在一成七上下，另有約接近兩成可歸為「其他」類別，另有一成一的民眾沒有具體的態度。因此，在兩個負面的情緒上，民眾在三位候選人中，對於朱立倫的負面情緒是明顯高於其他兩位參選人的。

至於民眾對於候選人的正面情緒上，毫無意外地，民進黨參選人在讓選民「覺得臺灣有希望」或是感到「身為臺灣人的驕傲」上，各有約五成一或四成八的正面情緒，朱立倫則為一成一到 8 個百分點，宋楚瑜則是接近一成或是 6 個百分點。民眾屬於「都是」或是「都沒有」的「其他」類別從一成七到兩成六不等，另外約有一成二上下的民眾沒有表示具體態度。

表 1 民眾對 2016 年三位總統候選人的情緒反應分布表[§]

	會生氣	不放心	有希望	感驕傲
朱立倫	42.1%	36.9%	10.5%	7.9%
蔡英文	8.9%	16.1%	50.8%	47.8%
宋楚瑜	9.7%	17.2%	9.5%	6.0%
其他*	28.3%	18.7%	16.8%	26.4%
無反應 ⁺	11.0%	11.2%	12.4%	11.9%
總計	100.0%	100.0%	100.0%	100.0%
(樣本數)	(1,690)	(1,690)	(1,690)	(1,690)

資料來源：黃紀（2016）。

說明：[§]問卷題目請參考文內說明。表格數字為直欄百分比（括號內為樣本數）。

* 其他包括：都是、都沒有。

⁺ 無反應包括：拒答、無意見、不知道。

因此，在 2016 年選舉期間，大約有過半的民衆對於民進黨參選人具有正面的情緒，但卻有超過三分之一到四成二的民衆，對國民黨參選人有負面情緒，難怪這次的選舉，讓國民黨參選人選得備極艱辛，也讓民進黨不但在總統選舉中大勝，並在國會中取得絕佳的勝利。當然，本研究將探討：民衆對候選人的各種情緒，對他們的投票傾向有何影響？我們先以雙變數分析 (bivariate analysis) 來檢視對候選人的各種情緒與其投票對象的交叉分析，但因為並未控制其他變數，因此，在詮釋上必須特別注意。

從表 2 中我們可以發現：當朱立倫讓民衆覺得生氣時，有八成五支持蔡英文，另有一成二支持宋楚瑜。同樣地，當民衆對蔡英文生氣時，有接近八成七支持朱立倫，表示支持宋楚瑜的約有一成。如果宋楚瑜讓選民覺得生氣時，他們的表示支持朱立倫者稍多，約五成四，另有四成六則支持蔡英文。至於民衆在這個情緒上是屬於「都是」或是「都沒有」的「其他」類別時，超過三分之一支持朱立倫，有五成二支持蔡英文，一成三支持宋楚瑜。至於另外一個負面情緒對候選人的影響如何？我們從表 2 的第二部分可以發現：當民衆覺得朱立倫讓他們不放心時，約有八成五的民衆表示其支持蔡英文，另有約一成一支持宋楚瑜。同樣地，當蔡英文讓民衆覺得不放心時，有八成的民衆是支持朱立倫的，另有約一成五則挺宋楚瑜。至於宋楚瑜讓民衆覺得不放心時，有七成的民衆支持蔡英文，另有大約兩成七投給朱立倫。所以，當民衆對兩位主要候選人有負面的情緒時，較傾向投給另外一位候選人，但對第三黨候選人的負面情緒，則出現在民衆對他生氣支持泛藍的朱立倫較多、但是對他不放心者，較多支持民進黨的蔡英文。

至於民衆對於候選人的正面情緒，是否可以獲得民衆更多的支持？我們從表 2 的第三部分可以發現：當兩位主要候選人讓民衆覺得臺灣有希望時，他們各獲得九成一到九成五的選票支持，正面情緒的力量真的不容小覷。不過，對於第三黨參選人宋楚瑜而言，當民衆認為他讓他們覺得臺灣有希望時，可以爭取到五成二的支持，但還有近三成的民衆支持朱立倫，另有近兩成投給蔡英文。此外，當民衆在這個情緒上是「其他」這種沒有特別的反應時，支持朱立倫的有五成二，約三分之一支持蔡英文，七分之一支持宋楚瑜，這一發現與上述的負面情緒並不同。至於當民衆認為朱立倫讓他們感到「身為臺灣人的驕傲」時，有超過九成五支持他，蔡英文也獲得對她擁有這樣正面情緒民衆中的八成七支持，宋楚瑜則獲得六成的支持，但還是有近三成是支持朱立倫，近一成支持蔡英文。如果民衆對此一情緒沒有具體反應時，支持蔡英文的比例較朱立倫略低，分別是四成一與四成九。

從表 2 的初步交叉分析，我們發現負面情緒對於政黨候選人的殺傷力不小，一旦有負面情緒，對他們的支持度一定降到 6 個百分點以下。而正面的情緒則能為兩個主要政黨參選人爭取到八成七到九成五的支持度。相對來說，對於第三黨的候選人，宋楚瑜，即使讓民衆對他有正面情緒，在轉換成選票的能力上卻較差一些，大約只有五成二到六成一左右。

表 2 民眾的政治情緒以及 2016 總統選舉投票對象交叉表

	朱立倫	蔡英文	宋楚瑜	統計資訊
橫列總計 % (樣本數)	27.3% (341)	62.5% (781)	10.3% (128)	
會生氣				
朱立倫	3.1%	85.0%	11.9%	$X^2=482.91$
蔡英文	86.9%	3.1%	10.0%	df=6
宋楚瑜	53.4%	45.9%	0.8%	$p<0.001$
其他	35.2%	52.2%	12.7%	N=1,166
不放心				
朱立倫	4.7%	84.3%	10.9%	$X^2=500.64$
蔡英文	80.1%	5.4%	14.5%	df=6
宋楚瑜	26.8%	70.0%	3.2%	$p<0.001$
其他	31.4%	54.3%	14.4%	N=1,159
有希望				
朱立倫	94.3%	2.5%	3.1%	$X^2=926.90$
蔡英文	5.5%	90.9%	3.6%	df=6
宋楚瑜	28.9%	19.0%	52.1%	$p<0.001$
其他	52.0%	32.4%	15.5%	N=1,151
感驕傲				
朱立倫	95.0%	2.5%	2.5%	$X^2=761.89$
蔡英文	6.8%	87.2%	6.0%	df=6
宋楚瑜	29.1%	10.1%	60.8%	$p<0.001$
其他	48.8%	41.2%	10.0%	N=1,154

資料來源：黃紀（2016）。

說明：問卷題目請參考文內說明。表格數字為橫列百分比。

二、政治情緒與投票傾向

由於交叉列表並未控制其他的變數，所以我們進一步將選舉研究其他的相關變數納入主要控制變數，然後才能確定：在控制其他變數之後，民眾對於三位候選人的情緒仍然對其投票行為具有顯著的影響。我們將民眾對三位候選人在上述四種情緒的反應編碼為每種情緒三個虛擬變數。例如，在覺得朱立倫讓他生氣時，我們編碼為 1，其他三項（包括蔡英文、宋楚瑜與「其他」）為 0；在覺得蔡英文讓他生氣時，也編碼為 1，其他三項為 0；對宋楚瑜也是相同的處理方式，而我們以表 2 的第四項「其他」作為對照組。這樣會有每一種情緒會針對 3 位候選人共計有 3 個虛擬變數，而四種情緒則共計 12 個虛擬變數。

由於 12 個虛擬變數放入模型中，讓我們的估計結果可能因為變數之間的共線性問

題，在相關的檢定上出現較為保守的統計檢定結果。⁴ 因此，我們也利用因素分析的方法，試圖將對三位候選人的情緒，簡化為正面情緒與負面情緒兩類，這一部分的統計分析將會隨後呈現。

由於依變數是選民對三位候選人的投票抉擇，因此，屬於有序多分的變數，可使用多項勝算對數 (Multinomial Logit) 模型，但必須不違反「獨立不相關選項」(independence of irrelevant alternatives, IIA) 的假定 (黃紀與王德育 2012, 234-238)。我們先針對三分類的多項勝算對數模型進行「獨立不相關選項」的檢驗，檢驗結果無法拒絕「獨立不相關選項」的假設，表示可以使用多項勝算對數模型進行分析。⁵ 由於朱立倫是執政的國民黨參選人，因此，我們在模型中以他為對照組，檢視民衆在他與其他兩位在野的候選人之間的抉擇。表 3 中將一般投票行為中的重要變數納入進行控制，這一部分國內外相關的研究不少，⁶ 我們也參考 Achen 與 Wang(2017, 280) 將解釋臺灣選民投票傾向的政黨認同、對候選人喜好程度以及民衆在統獨或是臺灣人認同等變數納入。如果納入上述變數之後，仍然發現本研究所強調的民衆對三位候選人的情緒反應，具有重要的解釋力的話，將顯示本研究關切的民衆政治情緒，對於解釋臺灣民衆的投票行為具有重要的影響力。

我們先看表 3 中影響民衆對蔡英文以及朱立倫兩位主要候選人投票抉擇的因素。首先，是對朱立倫或是對蔡英文的兩種負面情緒：當民衆認為蔡英文讓他不放心時，控制其他變數之後，他在蔡英文與朱立倫之間投票的機率比，變為原來的 0.24 倍 (也就是： $\exp[-1.44]=0.24$)，而當民衆認為朱立倫讓他生氣時，他在蔡英文與朱立倫之間投票的機率比，變為原來的 3.78 倍 (也就是： $\exp[1.33]=3.78$)。這個研究結果與前述 Marcus 與 MacKuen(1993) 頗不相同，換言之，在臺灣的選舉政治中，當民衆對於候選人擔心或是生氣時，是對他的投票行為具有顯著影響力的。不過，表 3 也有另一個正面的消息，就是當民衆認為蔡英文讓他們覺得有希望時，會在她與朱立倫之間更傾向投給蔡英文。至於宋楚瑜讓民衆覺得驕傲時，則傾向投給朱立倫的機率，較他要投給蔡英文的機率為高。這一部分相對來說，部分驗證了本研究的理論，但是對於第三黨參選人為何可以左右選民對其他兩位主要候選人的支持，則較無理論基礎可以解釋。為了瞭解表 3 的各種情緒因素，對於選民投票機率的變化，我們以邊際變化的預測機率，呈現在表 4 中。在表 4 中我們可以看

⁴ 本研究針對表 3 與表 6 兩個模型的解釋變數，透過條件指標 (conditional index, CI) 與變異膨脹因子 (Variance-inflating factor, VIF) 的檢驗，均發現模型中變數之間並不存在嚴重的共線性的問題。表 3 各解釋變數的 VIF 最大值為 3.10，最大 CI 約 21.7。表 6 各解釋變數的 VIF 最大值為 3.26，最大 CI 約 21.1。

⁵ 我們利用 Hausman-McFadden(HM) 檢定來檢視獨立不相關選項 (independence of irrelevant alternatives, IIA) 假定，因為通過該檢定，所以使用多項勝算對數模型。

⁶ 可以參考黃紀、劉義周與陳陸輝 (2013) 所做的文獻整理。

到：控制其他變數之後，對朱立倫生氣的情緒，讓民衆投給他的機率下降了 5.6%；而選民有對蔡英文不放心的情緒時，對朱立倫支持的機率就增加了 5.4%。此外，當民衆有蔡英文讓他們覺得有希望的情緒時，投給她的機率會上升 5.1%。

表 3 第二部分，我們檢視哪些因素左右民衆支持宋楚瑜或是朱立倫，表中也可以發現：當控制其他變數之後，民衆覺得朱立倫讓他們生氣時，較傾向支持宋楚瑜，在控制其他變數之後，民衆投給宋楚瑜與朱立倫之間的機率比，可以增加為原先的 4.35 倍。相對地，當蔡英文讓他們覺得不放心時，他們在宋楚瑜與朱立倫之間，較傾向支持朱立倫（雙尾假設檢定達到 0.10 的顯著程度）。就表 3 第二部分，我們並未驗證正面的情緒讓民衆更傾向支持該候選人，這當然可能因為宋楚瑜相對來說聲勢不及兩位主要候選人。不過，從表 4 中我們也進一步發現：當民衆覺得宋楚瑜讓他們覺得驕傲時，其投票機率增加了 13.4%。因此，對於非主要政黨候選人來說，激起選民的熱情，無疑地，對於吸收更多選票具有重要的效果。此外，在表 3 中我們也發現，控制其他變數之後，民衆的教育程度（大專及以上）、傾向泛藍的政黨認同、臺灣人認同、統獨傾向以及對三位候選人好惡程度的情感溫度計，也對其投票決定具有重要的影響。

不過，從本研究的初步發現，似乎與前述 Marcus 與 MacKuen(1993) 的發現頗不相同。本研究初步發現：民衆對候選人的生氣或是不放心的負面情緒，對於他們的投票抉擇具有重要的影響。當然，對於蔡英文或是宋楚瑜的正面情緒也具推波助瀾之效。因此，從表 3 與表 4 的初步分析，我們發現：就在野黨的候選人來說，引起民衆的熱情，是獲得更多選票的重要因素。因此，在 2016 年的選舉中，對執政黨而言，其提名的候選人若是讓民衆充滿負面的情緒，當然不利選情，此時，儘管以負面選舉讓民衆對主要在野黨候選人產生疑慮，也僅是扳平兩人的聲勢，並無法進一步超越對手。從表 4 中可以發現：民衆對朱立倫生氣（機率變化 5.6%）與對蔡英文不放心（5.4%）的機率變化相若，但是蔡英文讓民衆覺得有希望時，另外又增加了 5.1% 的支持度，讓朱立倫更居下風。

表 3 選民在 2016 年投票抉擇的多項勝算對數模型：各種情緒對投票行為的影響

	蔡英文 / 朱立倫			宋楚瑜 / 朱立倫		
	係數	標準誤顯著性	Exp(B)	係數	標準誤顯著性	Exp(B)
不同類型的情緒						
對朱立倫生氣	1.33	0.61*	3.78	1.47	0.59*	4.35
對蔡英文生氣	-0.61	1.09	0.54	-0.20	0.70	0.82
對宋楚瑜生氣	-0.90	0.71	0.41	-0.78	1.16	0.46
對朱立倫不放心	0.21	0.65	1.23	0.09	0.67	1.09
對蔡英文不放心	-1.44	0.65*	0.24	-1.17	0.61 ^s	0.31
對宋楚瑜不放心	0.69	0.64	1.99	-0.06	0.78	0.94
朱立倫讓我覺得有希望	0.36	0.97	1.43	0.18	0.76	1.2
蔡英文讓我覺得有希望	0.88	0.48 ^s	2.41	-0.25	0.55	0.78
宋楚瑜讓我覺得有希望	0.71	0.68	2.03	0.85	0.60	2.34
朱立倫讓我覺得驕傲	-1.38	1.31	0.25	-0.09	0.93	0.91
蔡英文讓我覺得驕傲	0.60	0.47	1.82	0.81	0.52	2.25
宋楚瑜讓我覺得驕傲	-1.86	0.96 ^s	0.16	0.92	0.64	2.51
性別 (女性 =0)						
男性	0.14	0.38	1.15	-0.59	0.39	0.55
年齡層 (40-59 歲 =0)						
20-39 歲	-0.19	0.46	0.83	0.27	0.45	1.31
60 歲及以上	-0.18	0.60	0.84	-0.84	0.63	0.43
教育程度 (中學 =0)						
國小及以上	1.13	0.78	3.10	0.10	0.92	1.11
大專及以上	1.54	0.45 ^{***}	4.66	0.27	0.42	1.31
省籍 (大陸各省 =0)						
本省閩南	0.81	0.53	2.25	0.30	0.52	1.35
本省客家	0.67	0.69	1.95	0.80	0.65	2.23
政黨傾向 (無傾向 =0)						
傾向泛藍	-2.88	0.50 ^{***}	0.06	-1.04	0.47*	0.35
傾向泛綠	1.09	0.68	2.97	-0.13	0.79	0.88
台灣人認同 (其他 =0)						
認為自己是台灣人	0.67	0.40 ^s	1.95	-0.16	0.41	0.85
統獨傾向 (維持現狀 =0)						
傾向統一	1.06	0.56 ^s	2.89	0.53	0.53	1.70
傾向獨立	1.14	0.64 ^s	3.13	1.24	0.64 ^s	3.46
對朱立倫好惡程度	-1.01	0.16 ^{***}	0.36	-1.05	0.16 ^{***}	0.35
對蔡英文好惡程度	0.89	0.15 ^{***}	2.44	0.28	0.14*	1.32
對宋楚瑜好惡程度	0.17	0.11	1.19	0.85	0.13 ^{***}	2.34
常數	-2.63	0.98 ^{**}	0.07	-1.63	0.97 ^s	0.20
統計資訊						
Pseudo R ² =0.75; N=1,099; LR Chi ² (54)=1459.09; Log Likelihood=-242.93; p<0.001						

資料來源：黃紀 (2016)。

說明：***p<0.001; **p<0.01; *p<0.05; ^sp<0.10 (雙尾檢定)。

表 4 選民情緒變化對投票抉擇影響的機率預測

	朱立倫顯著性	蔡英文顯著性	宋楚瑜顯著性
對朱立倫生氣	-0.056*	0.021	0.034
對蔡英文生氣	0.016	-0.022	0.006
對宋楚瑜生氣	0.032	-0.021	-0.011
對朱立倫不放心	-0.006	0.007	-0.001
對蔡英文不放心	0.054*	-0.038	-0.016
對宋楚瑜不放心	-0.012	0.030	-0.018
朱立倫讓我覺得有希望	-0.010	0.011	-0.001
蔡英文讓我覺得有希望	-0.015	0.051*	-0.036 [§]
宋楚瑜讓我覺得有希望	-0.029	0.009	0.020
朱立倫讓我覺得驕傲	0.029	-0.064	0.035
蔡英文讓我覺得驕傲	-0.027	0.007	0.020
宋楚瑜讓我覺得驕傲	0.010	-0.144*	0.134*

資料來源：黃紀（2016）。

說明：1. 本表以表 3 估計的結果，控制其他變數為平均數之後，看各政治情緒的變數分別代入 0 與 1 兩個數值之後，選民投給三位候選人機率的變化。

2. 顯著性：*** $p < 0.001$; ** $p < 0.01$; * $p < 0.05$ （雙尾檢定）。

除此之外，我們也將民衆對於 3 位候選人的四類情緒，分別進行因素分析，並以最大變異的方法進行轉軸，結果萃取出針對三位候選人各 2 種情緒。⁷ 從表 5 中可以發現，對於蔡英文的兩種因素，分別是正面情緒與負面情緒，同樣地，對朱立倫也可以萃取出正面情緒與負面情緒兩個情緒，同樣地，也可以對宋楚瑜找出正面與負面兩種情緒。因此，我們在後續的分析，運用這六個因素來檢視他們對於民衆投票行為的影響。

⁷ 由於民衆對三位候選人的四種情緒，經過本研究重新編碼屬於 0 與 1 的類別資料，因此，本研究以多邊相關矩陣 (polychoric correlation matrix) 來進行因素分析，結果呈現在表 5 中。如何運用 Stata 進行該統計方法，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參考以下連結：<https://stats.idre.ucla.edu/stata/faq/how-can-i-perform-a-factor-analysis-with-categorical-or-categorical-and-continuous-variables/>（檢索日期：2018 年 10 月 12 日）。作者感謝審查人寶貴的建議。

表 5 民眾對三位總統參選人情緒好惡的因素分析表

	轉軸後成分矩陣					
	蔡英文		朱立倫		宋楚瑜	
	正面情緒	負面情緒	正面情緒	負面情緒	正面情緒	負面情緒
有希望	0.81	-0.47	0.87	-0.41	0.83	-0.39
感驕傲	0.82	-0.37	0.88	-0.35	0.83	-0.13
會生氣	-0.51	0.66	-0.51	0.72	-0.34	0.50
不放心	-0.50	0.66	-0.42	0.72	-0.46	0.51
特徵值	1.84	1.23	1.35	1.32	1.71	0.68
解釋變異量 %	64.3	42.9	63.0	42.8	80.6	32.0

資料來源：黃紀（2016）。

說明：請參考註腳 7。

在表 6 中，我們將民眾對於三位候選人的四類情緒轉換成正面或是負面兩種情緒，在表中的第一部分，我們可以發現：在控制其他變數之後，左右民眾在蔡英文與朱立倫抉擇的因素，主要是民眾對於蔡英文是較為正面的情緒，以及對兩位候選人負面的情緒。當民眾對蔡英文正面情緒每上升一個單位，在控制其他變數之後，他們投給蔡英文相對於朱立倫的機率比就增加為原來的 9.12 倍，相對而言，當民眾對蔡英文負面情緒每上升一個單位，他們投給蔡英文相對於朱立倫的機率比就降低為原來的 0.05 倍。除此之外，我們也發現：民眾對於朱立倫的負面情緒也讓民眾更不傾向支持他。當民眾對其負面情緒每增加一個單位，其投票給蔡英文相對於朱立倫的機率比就變為原來的 4.44 倍。我們也以表 7 觀察選民對兩位候選人的正負情緒，如何影響其支持度的變化。在控制其他變數為平均數之後，對蔡英文的正面情緒從最低上升至最高時，投給她的機率增加 12.3%，而投給朱立倫的機率則下降了 8.7%。至於民眾對朱立倫的負面情緒由最低上升至最高時，投給他的機率下降約 7 個百分點。當然，民眾對蔡英文的負面情緒會讓其投給朱立倫的機率上升約 12 個百分點，而讓蔡英文損失 13.4% 的支持度。

表 6 選民在 2016 年投票抉擇的多項勝算對數模型：正負面情緒的影響評估

	蔡英文 / 朱立倫			宋楚瑜 / 朱立倫		
	係數	標準誤顯著性	Exp(B)	係數	標準誤顯著性	Exp(B)
正面 / 負面情緒						
對朱立倫正面情緒	-0.92	1.15	0.40	-0.46	0.89	0.63
對朱立倫負面情緒	1.49	0.76*	4.44	1.67	0.71*	5.31
對蔡英文正面情緒	2.21	0.61***	9.12	0.89	0.68	2.44
對蔡英文負面情緒	-2.98	1.00**	0.05	-1.34	0.83*	0.26
對宋楚瑜正面情緒	-0.63	0.93	0.53	1.69	0.71*	5.42
對宋楚瑜負面情緒	-0.89	0.90	0.41	0.17	0.88	1.19
性別 (女性 =0)						
男性	0.27	0.37	1.31	-0.54	0.38	0.58
年齡層 (40-59 歲 =0)						
20-39 歲	-0.01	0.44	0.99	0.41	0.44	1.51
60 歲及以上	0.00	0.58	1.00	-0.66	0.61	0.52
教育程度 (中學 =0)						
國小及以上	0.92	0.75	2.51	0.01	0.9	1.01
大專及以上	1.58	0.44***	4.85	0.19	0.41	1.21
省籍 (大陸各省 =0)						
本省閩南	0.78	0.52	2.18	0.21	0.50	1.23
本省客家	0.67	0.68	1.95	0.80	0.63	2.23
政黨傾向 (無傾向 =0)						
傾向泛藍	-2.64	0.47***	0.07	-0.98	0.45*	0.38
傾向泛綠	0.95	0.63	2.59	0.37	0.74	1.45
台灣人認同 (其他 =0)						
認為自己是台灣人	0.67	0.39 ^s	1.95	-0.12	0.40	0.89
統獨傾向 (維持現狀 =0)						
傾向統一	0.92	0.54 ^s	2.51	0.46	0.52	1.58
傾向獨立	1.11	0.61 ^s	3.03	1.19	0.62 ^s	3.29
對朱立倫好惡程度	-1.04	0.16***	0.35	-1.08	0.16***	0.34
對蔡英文好惡程度	0.91	0.15***	2.48	0.61	0.13*	1.84
對宋楚瑜好惡程度	0.18	0.11	1.20	0.87	0.12***	2.39
常數	-2.66	0.95	0.07	-1.88	0.96*	0.15
統計資訊	Pseudo R ² =0.74; N=1,099; LR Chi ² (42)=1441.52; Log Likelihood=-251.71; p<0.001					

資料來源：黃紀 (2016)。

說明：***p<0.001; **p<0.01; *p<0.05; ^sp<0.10 (雙尾檢定)。

表 7 選民情緒變化對投票抉擇影響的機率預測

	朱立倫顯著性	蔡英文顯著性	宋楚瑜顯著性
對朱立倫正面情緒	0.038	-0.042	0.004
對朱立倫負面情緒	-0.069*	0.025	0.044
對蔡英文正面情緒	-0.087**	0.123**	-0.037
對蔡英文負面情緒	0.116**	-0.134*	0.019
對宋楚瑜正面情緒	-0.030	-0.097*	0.127*
對宋楚瑜負面情緒	0.016	-0.049	0.033

資料來源：黃紀（2016）。

說明：1. 本表以表 6 估計的結果，控制其他變數為平均數之後，看各政治情緒的變數分別代入最小與最大兩個數值之後，選民投給三位候選人機率的變化。

2. *** $p < 0.001$; ** $p < 0.01$; * $p < 0.05$ （雙尾檢定）。

在表 6 的右半部分，我們也發現：當民衆在宋楚瑜以及朱立倫兩者之間作抉擇時，在控制其他變數之後，民衆對於宋楚瑜的正面情緒愈高，愈傾向支持宋楚瑜。我們看到每增加 1 個正面情緒的刻度，控制其他變數之後，他們支持宋楚瑜相對於朱立倫的機率比會增加為原來的 5.42 倍。此外，當民衆對於其他兩位候選人有負面情緒時，會影響他們投給宋楚瑜或是朱立倫的意願。毫無意外的是，當他們對朱立倫有負面情緒，在控制其他變數之後，這個負面情緒每增加一個單位，投給宋楚瑜相對於朱立倫的機率比會增加為原先的 5.31 倍。如果是對蔡英文有負面情緒，支持朱立倫的機率會提高。除此之外，利用表 7 檢視民衆對於宋楚瑜的正面情緒，由最低上升到最高時，他們支持宋楚瑜的機率會上升將近 13 個百點。因此，與我們上述分析蔡英文的趨勢類似，當民衆對於挑戰者具有正面情緒，會更傾向將選票投給他們。因此，在選舉政治中，一個挑戰者如何帶動民衆的熱情相當重要。

我們也從表 6 看到跟表 3 類似的結果，就是在我們控制其他變數之後，民衆的教育程度（大專及以上）、傾向泛藍的政黨認同、臺灣人認同、統獨傾向以及對三位候選人好惡程度的情感溫度計，也對其投票決定具有重要的影響。表 3 與表 6 雖然在情緒變數的處理上不同，不過，其他控制變數的重要性並未因此改變，且係數變動的幅度並不大。

我們也進一步比較兩種模型的優劣，我們運用 Akaike's Information Criterion(AIC) 以及 Bayesian's Information Criterion(BIC) 兩種統計數據來看看放入對三位候選人 4 種情緒共計 12 個變數的模型（表 3）以及對三位候選人正負兩種情緒共計 6 個變數的模型（表 6）那個較佳。參考黃紀與王德育（2012, 140）的建議，我們以那個模型在上述的數值較小，視為較佳的模型。從表 8 中我們發現：納入正面與負面兩類共 6 個情緒變數的模型，他們在 AIC 或 BIC 的數值均較小。若是比較 BIC 的資訊，其差異大於 10。顯示表 6 的模

型比表 3 的模型為佳（黃紀與王德育 2012, 141），因此，在未來的研究中，我們可以將變數精簡為正負兩類情緒，讓模型更為簡約 (parsimonious)。

表 8 正負面情緒與四種情緒的模型比較

	四種情緒	正負面情緒	差異 (四種 - 正負面)
AIC	597.87	591.42	6.45
BIC	877.99	811.51	66.48

資料來源：黃紀（2016）。

說明：我們利用表 3 的四種情緒共計 12 個變數為第一個四種情緒模型，表 6 的正負面情緒的兩種情緒共計 6 個情緒變數為第二個正負面情緒模型。

伍、結論

在本研究中，我們檢視在 2016 年選舉中，民衆的政治情緒對於他們投票行爲的影響。本研究發現：在三位總統候選人中，民衆對於朱立倫的負面情緒最高，而蔡英文則得到民衆正面評價最多。在本研究中我們也呈現：民衆對候選人生氣、不放心等負面情緒或是候選人讓他們覺得有驕傲或是希望的正面情緒，對於選舉會產生重要的影響。對照國外的研究，我們發現：民衆對於兩位在野黨的候選人——蔡英文或宋楚瑜——一旦擁有正面的情緒，對他們的支持度顯著提升。這一部分與國外的研究發現頗為相似。不過，對於朱立倫的正面情緒，似乎無法讓他爭取到更多的支持。相對而言，民衆對朱立倫的負面情緒，會讓他的支持度顯著下降。我們也發現，民衆對蔡英文的負面情緒，也會影響民衆對她的支持度。國外的研究著重在負面情緒會啓動民衆行爲抑制系統，轉而因為負面情緒帶來的警訊，而更關注選舉，或是蒐集與候選人相關的資訊，但是，並不會進一步影響他們的投票行爲。本研究發現，在臺灣的環境之下，負面情緒也同樣具有影響選民投票行爲的顯著效果。

爲了讓模型更為簡約，也便於讓我們的研究與國外比較，我們利用因素分析將上述四種情緒建構出正面與負面兩種情緒，在因素的萃取上我們獲得正面與負面兩種情緒，與國外相同。本研究也發現：民衆對於蔡英文的正面情緒是讓她在這次選舉中勝選的一大助力，而當民衆對蔡英文有負面情緒時，對朱立倫的支持度也顯著上升。至於宋楚瑜則主要獲得對他有正面情緒者的支持。值得注意的是，在 2016 年的選舉中，民衆對於朱立倫的正面情緒所扮演的影響力並不顯著，但是，對其負面的情緒，讓他流失一定的票源。因此，呼應前一段的論述，本研究認爲，對一個主要的挑戰者來說，如何在一個選舉中帶給民衆熱情與希望，是吸引他們走出家裡，走進投票所，投下他們神聖一票的重要關鍵。

至於民衆對於朱立倫或是蔡英文的負面情緒，也對其投票行為產生影響的原因，本研究從研究方法以及臺灣的政治環境加以討論。首先，就研究方法而言，由於 TEDS2016 的資料係選後執行的訪問，因此，民衆會不會因為選舉結果才有上述的情緒反應？特別是國民黨在總統與立委選舉雙重挫，會不會因為這個原因，導致民衆對於朱立倫的負面情緒產生影響？而因為選舉結束到總統上任之間的週期頗長，當選的蔡英文總統也開始針對一些重要政策發表意見，也正是本研究執行的期間，民衆是否對若干內容產生負面情緒反應，使得我們在資料分析時，發現這些負面情緒與其投票行為產生關聯？這一部分值得注意。可惜該調查選前的電話訪問並沒有政治情緒的相關問題，所以無法具體檢驗因果順序，這個議題頗值得後續的研究加以繼續分析。

本研究特別之處，是在納入了研究臺灣選舉政治的相關重要變數之後，還可以突顯出政治情緒在解釋民衆投票行為的重要性。顯示未來在研究臺灣選舉政治時，民衆的政治情緒應予納入考量。當然，民衆對於特定政治人物的政治情緒並不是一成不變的，往往會因為該政治人物執政或卸任後、有所為或有所不為時，而出現重要的改變。特別是執政黨在採取任何政策或是執行具體措施之後，必定讓民衆有得有失，也自然會引起部分民衆的掌聲或是怨懟，進而讓民衆對其產生正面或是負面的情緒反應。也因此，本研究發現之重要，在於更進一步突顯，民衆對政治人物的情緒波動，正是民主國家選舉政治持續與變化重要動力。

* * *

投稿日期：107.05.22；修改日期：107.08.22；接受日期：107.11.23

參考文獻

I. 中文部分

陳陸輝主編，2018，《2016 臺灣大選：新民意與新挑戰》，台北：五南。

(Chen, Lu-huei. 2018. *Er ling yi liu Tai wan da xuan: Xin min yi yu xin tiao zhan* [The 2016 Presidential Election in Taiwan: New Mandate and New Challenges]. Taipei: Wunan.)

黃秀端，1996，〈決定勝負的關鍵：候選人特質與能力在總統選舉中的重要性〉，《選舉研究》，3(1): 103-135。

(Hwang, Shioh-duan. 2004. “Jue ding sheng fu de guan jian: Hou xuan ren te zhi yu neng li zai zong tong xuan ju zhong de zhong yao xing” [The Importance of Candidate Images and Capabilities in Presidential Elections]. *Journal of Electoral Studies* 3(1): 103-135.)

黃紀，2016，《2012 年至 2016 年「選舉與民主化調查」四年期研究規劃 (4/4)：2016 年總統與立法委員選舉面訪案》，計畫編號：MOST 101-2420-H-004-034-MY4，台北：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

(Huang, Chi. 2016. “Taiwan’s Election and Democratization Study, 2012-2016 (IV): The Survey of Presidential and Legislative Elections, 2016 (TEDS2016).” MOST 101-2420-H-004-034-MY4. Taipei: Minist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search Project [Report].)

黃紀、王德育，2012，《質變數與受限依變數的迴歸分析》，台北：五南。

(Huang, Chi, and T. Y. Wang. 2012. *Zhi bian shu yu shou xian yi bian shu de hui gui fen xi* [Regression Analysis for Quantitative and Limited Dependent Variables]. Taipei: Wunan.)

黃紀、劉義周、陳陸輝，2013，〈臺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緣起、設計與發展〉，載於《臺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 (TEDS) 方法論之回顧與前瞻》，黃紀主編，台北：五南。

(Huang, Chi, I-chou Liu, and Lu-huei Chen. 2013. “Tai wan xuan ju yu min zhu hua diao cha: Yuan qi, she ji, yu fa zhan” [Taiwan’s Election and Democratization Studies: Origins, Designs, and Prospective]. In *Tai wan xuan ju yu min zhu hua diao cha fang fa lun zhi hui gu yu qian zhan* [Methodology of Taiwan’s Election and Democratization Studies: Reviews and Prospective], ed. Chi Huang. Taipei: Wunan.)

鄭夙芬、陳陸輝、劉嘉薇，2005，〈2004 年總統選舉中的候選人因素〉，《臺灣民主季刊》，2(2): 31-70。

(Cheng, Su-feng, Lu-huei Chen, and Jia-wei Liu. 2005. “Er ling ling si nian zong tong xuan ju zhong de hou xuan ren yin su” [The Candidate Factor in Taiwan’s 2004 Presidential Election].

Taiwan Democracy Quarterly 2(2): 31-70.)

II. 英文部分

Abelson, Robert, Donald Kinder, Mark Peters, and Susan Fiske. 1982. "Affective and Semantic Components in Political Person Percept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42(4): 619-630.

Achen, Christopher H., and T. Y. Wang, eds. 2017. *The Taiwan Voter*.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Brader, Ted. 2014. "The Emotional Foundations of Democratic Citizenship." In *New Directions in Public Opinion*, ed. Adam Berinsky.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Brader, Ted, and George E. Marcus. 2013. "Emotion and Political Psychology." In *The Oxford Handbook of Political Psychology*, eds. Leonie Huddy, David O. Sears, and Jack S. Levy. 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Brader, Ted, Nicholas Valentino, and Elizabeth Suhay. 2008. "What Triggers Public Opposition to Immigration? Anxiety, Group Cues, and Immigration Threat."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52(4): 959-978.

Campbell, Angus, Philip E. Converse, Warrant E. Miller, and Donald Stokes. 1960. *The American Voter*. New York: Wiley.

Conover, Pamela Johnston, and Stanly Feldman. 1986. "Emotional Reactions to the Economy: I'm Mad as Hell and I'm Not Going to Take it Anymore."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30(1): 50-78.

Fiorina, Morris P. 1981. *Retrospective Voting in American National Election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Fiske, Susan T., and Mark Pavelchak. 1985. "Category-Based versus Piecemeal-Based Affective Responses: Developments in Schema-Triggered Affect." In *The Handbook of Motivation and Cognition: Foundations of Social Behavior*, eds. Richard M. Sorrentino and E. Tory Higgins. New York: Guilford.

Fiske, Susan T., and Shelley E. Taylor. 1991. *Social Cognition* (2nd ed.). New York: McGraw-Hill Book Company.

Gray, J. A. 1987. *The Psychology of Fear and Stress* (2nd 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oughton, David Partick. 2009. *Political Psychology: Situations, Individuals, and Cases*. New

-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 Lazarus, Richard. 1991. *Emotions and Adap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Lerner, Jennifer S., and Dacher Keltner. 2001. "Fear, Anger, and Risk."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81(1): 146-159.
- Lodge, Milton, Kathleen M. McGraw, and Patrick Stroh. 1989. "An Impression-Driven Model of Candidate Evaluat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3(2): 399-419.
- Marcus, George E., and Michael B. MacKuen. 1993. "Anxiety, Enthusiasm, and the Vote: The Emotional Underpinnings of Learning and Involvement During Presidential Campaig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7(3): 672-685.
- Marcus, George E., W. Russell Neuman, and Michael MacKuen. 2000. *Affective Intelligence and Political Judgment*.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Miller, Warren E., and J. Merrill Shanks. 1996. *The New American Voter*.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Niemi, Richard G., and Herbert F. Weisberg. 2001. *Controversies in Voting Behavior*. Washington: CQ Press.
- Rahn, Wendy M., John H. Aldrich, John L. Sullivan, and Eugene Borgida. 1990. "A Social-Cognitive Model of Political Candidate Appraisal." In *Information and Democratic Processes*, eds. John Ferejohn and James Kuklinski. Urbana :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 Roseman, Ira, Robert Abelson, and Michael Ewing. 1986. "Emotions and Political Cognition: Emotional Appeals in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In *Political Cognition*, eds. Richard Lau and David Sears. Hillsdale: Lawrence Erlbaum.
- Valentino, Nicholas A., Krysha Gregorowicz, and Eric W. Groenendyk. 2009. "Efficacy, Emotions and the Habit of Participation." *Political Behavior* 31(3): 307-330.
- Wattenberg, Martin P. 1991. *The Rise of Candidate-Centered Politics: Presidential Elections of the 1980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olitical Emotions and the 2016 Presidential Election in Taiwan

Lu-huei Chen^{*}

Abstract

This study will examine how emotions might affect people's choice of vote. I will employ the 2016 Taiwan's Election and Democratization Study (TEDS 2016) to see how voters' emotions toward major presidential candidates affect their vote choices. Previous research argues that some positive emotions, such as hope and pride, and some negative emotions, such as anxiety and fear, might play critical roles in shaping citizens' opinions. For an open-seat presidential election, looking forward and reasoning back, voters employ hopeful and fearful emotions to make their voting decisions. As expected, voters with a fearful feeling toward Tsai Ing-wen are less likely to support her. We also find that those who are angry with Chu Li-luan tend not to vote for him. Emotions shed some light on our understanding of voting behavior in Taiwan.

Keywords: emotions, presidential election, Taiwan

^{*} Distinguished Research Fellow, Election Study Center and Taiwan Institute for Governance and Communication Research;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